

视察红军兵工厂^①

他对情况了如指掌 分析问题深刻透彻 工人们听得十分专注。

——马 文^②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为了解决反“围剿”中的枪炮弹药供应问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同志，亲自视察了中央苏区岗面红军兵工厂。

那时，我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企业部部长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长，曾在红军兵工厂工作过，因此陈云同志特地要我陪他前去视察。我们骑马从瑞金出发，经过七堡、九堡，途中住了一宿，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岗面。

岗面红军兵工厂，是在1931年10月建立于江西兴国县的官田村，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32年搬到了瑞金岗面。它的设备和技术虽然落后，但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却相当大。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对这个厂的创立和发展都很关切。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同志就是毛主席亲自派去的。高自立、杨立三、杨志诚、叶季壮等同志，都先

后领导过这个兵工厂的工作。

陈云同志这次来，主要是通过在基层找人个别谈话了解情况。他在这个工厂重点调查了枪炮科和弹药科 先后找了几十个人谈话 白天晚上都谈。谈话时 陈云同志十分注意听别人讲 中间很少插话 遇到他觉得不清楚的地方 才请人重复一遍 直到了解清楚为止。职工们虽然是第一次和陈云同志见面，但由于他的谈吐举止都很平易近人，因此大家都毫不拘束，非常愿意和他谈厂里的事。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工厂的各项任务都很紧 陈云同志为了不给厂领导增加负担，没有召集他们专门进行汇报 厂领导有什么困难或意见 他都在个别谈话中解决了。厂里也没有因为上级机关去了人而搞一些特殊招待。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中，陈云同志着重调查研究了这样几个问题：工厂每日生产各种产品多少 质量如何 支援第五次反“围剿”能再贡献多少？各种设备与工具的情况？行政管理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党政工团协调的怎样？工人的团结教育与生活福利情况？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在当时很少有人研究。

视察完岗面兵工厂后，我们又来到了塞上红军兵工杂械厂。在这个厂 陈云同志发现职工们普遍对该厂李厂长意见很大 主要是作风不民主 甚至打人、骂人、体罚职工。陈云同志掌握了这些情况后，与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 认为李厂长身上这种严重的军阀残余 阻碍了工人生

产积极性的发挥 已经成为生产的绊脚石 必须及时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处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云同志在大会讲话时的情景。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分析问题深刻透彻，工人们听得十分专注。当陈云同志宣布：鉴于李厂长的错误性质，必须给予撤职处分时，全厂职工热烈鼓掌拥护。大家纷纷议论：“这是哪里派来的‘包公’？”陈云同志及时果断地处理这个厂长的事情，很快传遍了连岗面在内的所有兵工厂，工人们对于共产党秉公办事、光明磊落十分称颂，生产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对支援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云同志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在生活上亦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堪称艰苦朴素的楷模。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到达岗面兵工厂时已近中午，当时我只和厂部总务科长打了个招呼，请他们安排陈云同志的食宿，就到下面找韩日升厂长去了。当我返回厂部时，已过中午，发现陈云同志还没有吃午饭，桌上放着一个香烟罐头盒子，我以为是进口香烟，好奇地打开来，陈云同志笑了笑说：“里面是辣椒粉，没菜的时候就用它下饭。”看着红红的辣椒粉，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不安，立即去总务科联系炒了一盘白菜，打来了饭，和陈云同志一块儿吃起来。

50 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当年随陈云同志视察兵工厂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陈云同志实事求是、深入群

众、胸怀磊落、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 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原题为《陈云同志视察红军兵工厂》。

马文，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企业部部长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长。曾在红军兵工厂工作。

遵义会议前后^①

没有一个老红军那样的威武，也不是老红军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可他却以这副身体，承受住了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的考验。

——刘 家 栋^②

我初到中央组织部时，那里人手确实很少，连同陈云、富春同志在内，也就只有十一二名干部。但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使我很快就消去了生疏感。后来，我从他们那里慢慢地知道了很多事情，知道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首先听到的是，陈云同志也是一个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出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我很吃惊。因为，陈云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1.7米的中等个，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但身体比较弱，脸色很不好。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丝毫没有老红军那样的威武，也不是老红军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可他却以这副身体，承受住了长征那么艰

苦的环境的考验。一种敬佩之情，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遭受过不少磨难。在大革命时期 我们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合作 以广州为中心 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 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那次合作 促进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还通过创办黄埔军校，着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但在孙中山去世 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逐渐占了上风的时候 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得蒋介石的阴谋一再得逞 最后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被吓倒，他们从腥风血雨中站了起来，掩埋了同伴的尸首，重新投入了战斗。党外一些坚定的革命者 如彭老总、贺老总、徐特立等，也恰恰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了。我们党成功地举起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红旗 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黑暗中高高举起了革命火炬。随后 又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没能正确认清革命已处低潮的形势，不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不区别哪些地方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 哪些地方只能组织有秩序的退却 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使得大革命失败

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再次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正确判断，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次大会的精神在全党贯彻以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再次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然而随着局势的好转我们党内的“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了。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却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调集了6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却借助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党内占据

了统治地位。王明所推行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比前两次更有过之。这一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最为惨重的损失。白区几乎全部瓦解，连临时中央都站不住脚，不得不撤到中央苏区来。

陈云同志就是这时来到中央苏区的，过去他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1934年1月，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陈云同志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但由于王明在根据地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造成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苏区呆不下去了，被迫进行长征。曾经负责管理军需生产的陈云同志，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白区工作，随军长征。他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又到中央军委纵队担任政治委员。

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行动，结果行动迟缓，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损失很大，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同。红军改道以后，甩开了追兵，攻下了黔北重地遵义，并赢得了十二天的休整时间。在打下遵义以后，陈云同志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判了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泽东同志担任红军总的领导。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关键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陈云同志后来曾经这样对我说，那次会议确实十分重要，起着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作用。所以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都分头下到部队去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想让部队的同志尽快知道这个精神。

会后，陈云同志专门撰写了一个《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到部队传达时很受欢迎，提纲就留在那里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曾有一段时间里，关于究竟都有谁参加了遵义会议是个争论的焦点。找出这份提纲手稿以后，经过很多专家，最后经过陈云同志本人的鉴定，证实这确实是陈云同志的字迹。

遵义会议精神贯彻以后，使中央红军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行军方式上一反以前忽东忽西、机动灵活、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处处掌握主动。四渡赤水，使敌军疲于奔命，兵临昆明，搞得敌人固守城池。然后，红军又突然

掉头向北 以急行军的速度 出敌不意地夺取了云南省禄劝县的金沙江皎平渡渡口。只要渡过金沙江 中央红军就可以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这时，渡口只有七条小船，要一下子送过去几万红军 确实不容易。怎么办 中央经过研究 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 陈云为政治委员 统一组织渡河。

陈云同志坐镇渡口，对部队谁先谁后作出了统一安排 谁都不准不按命令行事。同时 赶紧找船工 做好船工的工作。那些船工虽然都是苦出身 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成瘾。这些受害者，一染上毒瘾 没烟土就动不得。因此 陈云同志下令 对船工原来支起的大烟锅不能动。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大烟土，发给这些船工一部分。再多弄一点白酒来 满足供给。同时 对这些船工进行教育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说服这些船工和我们配合。在陈云同志严密的组织下，船工和部队很好配合，昼夜抢渡，终于赢得了时间。5月1日至9日 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 3万人 用了 9天 9夜的时间，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秩序井然 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 而这时候 船只已经烧毁 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这是红军长征中的一险 渡过这一险关 对于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敌军的追堵拦截，实现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参加过抢渡金沙江的宋任穷同志就这

样说过：“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应该说，陈云同志是红军渡这一险关的有功之臣。可当问及这件事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谈得很少，更多地是称赞红军铁的纪律和谈那些船工。话语中充满了对那些受害者的同情和对他们做出的努力的感谢。

陈云同志就是这样来看待自己和别人的。

有一次，他曾问我：“你知道在长征时我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吗？”我说：“不知道。”他就告诉我：“我们都是白天走路，晚上到宿营地后，要根据搜集到的敌人走到哪里了的情报进行研究，研究部署完了才能睡觉。只有一个人是白天行军，晚上却睡不成觉，那就是周胡子。他晚上要等各个部队都在什么地方宿营、遇到了什么情况的详细报告，确定第二天的部署，哪些继续前进，怎样对付敌人，然后到哪里去。等安排好这一切，由电报发出去了，天就亮了，只好白天在马上打个盹儿。那可是长期如此啊！在整个长征中都是这样过来的。陈云同志说的‘周胡子’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当时留着胡子，故大家称他‘周胡子’。”

节选自《陈云在延安》一书。

刘家栋，陈云的秘书。

指挥抢渡金沙江^①

陈云同志对每一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都计算得非常准确，渡江工作有条不紊。他还具体安排船夫吃好、休息好，歇人不歇船。

——陈 文陶^②

我是 1932 年从江西永新县老家参加红军的，第二年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4 年 10 月红军卫校随中央机关开始了长征。

红军过了湘江后，约在 1935 年 4、5 月间上级调我给陈云同志当卫生员。

金沙江位于云南、四川两省的交界处，水宽流急，虽然算不上天险，却也很不好过。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红军进入云南，恐怕我们抢渡金沙江。连日来，陆续调遣了部队，驻守在金沙江对岸的几百里防线上，不但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两岸的交通。这时红军有一、三、五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约三万余人，要想顺利渡江是不容易的。当时陈云同志任渡江指挥部司令员，指挥调度三军过江。

到了金沙江，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一军团抢占了龙街渡，干部团占了绞车渡（也称皎平渡）准备分头渡江。可实际上，洪门渡江面太宽，龙街渡水流太急，都无法迅速渡江，只有绞车渡江面不太宽，水流也不太急，且南岸是高山，北岸较平缓，是较为理想的渡江之处。可是三个军团和中央机关都集中到绞车渡，只搞到 7 只小船。大船一次可渡 40 人，小船每次只能载 10 个人。为使三军顺利过江，陈云同志根据船少人多的情况，非常细致地以分秒计算时间，同时作了战略部署。为了保证部队过江，五军团一部利用乌蒙山天险阻击尾追的敌人。乌蒙山在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境内，有 12 座高峰，蜿蜒数十里。由于把敌人甩得很远，五军团抢占天险以后，等了三天，追击的敌人姗姗而来。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第五天，党中央派李富春同志到五军团，动员指战员坚决顶住。五军团的同志表示，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挡在乌蒙山下。另一方面，渡江在紧张地进行着。渡江指挥部需要计算每小时、每一天可以渡江多少人，谁先过，谁后过，一点也不能乱。陈云同志对每一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都计算得非常准确，渡江工作有条不紊。他还具体安排船夫吃好，休息好，歇人不歇船。

来到金沙江畔，我在江边给陈云同志找了个土洞临时休息，他就在这江边指挥渡江。一天，朱德同志来和陈云同志一起研究渡江情况。我看他们都没吃饭，就把剩下的一些牛肉干放到石头上炒一炒，然后喊朱老总来吃。他

笑吟吟地一边走来，一边用鼻子嗅着烧肉的香味，连声说：“一定好吃，一定好吃。”他和陈云同志都开怀大笑起来，这在紧张殊死的战斗中是多么难得的笑声啊！

9天9夜，全军胜利过江，陈云同志是最后过江的。等我们走到江对岸的山顶上，回过头来，才看到有几个国民党兵来到江边，只拣到几只破草鞋，啥也没捞到。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儿，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重大胜利。

原题为《抢渡金沙江时的陈云同志》。

陈文陶，当时是陈云的卫生员。

从实际出发领导经济工作^①

在要求仔细核算的同时，还强调要抓紧监督检查。他指出 搞经济工作要有‘掌柜’的态度 当家的态度。当家就要理财“，检查要严格……‘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周太和^②

陈云同志在领导陕甘宁晋绥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中 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 充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我认为 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条：

（一）对经济情况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实际情况办事。陈云同志对凡属重大的问题 都事必躬亲。亲眼看 亲耳听 亲手写 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与在生产或工作第一线的同志进行深入讨论 交换看法。有什么问题 虚心向行家里手请教。对任何事情，他都要寻根究底 仔细思索。他常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但弄清楚事情的性质和客观规律 而且弄清楚准确的数量界限。比如，陈云同志经常到延安的南郊市场

去 既亲自看 又找人谈。并且还指派专人经常联系 听取情况 掌握准确的数据 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与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思考，决定具体的政策和实施步骤。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性。陈云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努力避免从主观愿望出发。困难多大 他一点不掩饰 有利因素也一点不遗漏。并且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 有多大的力量 办多大的事。在处理边币与法币的斗争时 虽然当时理论界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边区政治有独立性，法币应立即停止使用的建议，但是他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采取逐步壮大边币实力 利用法币打击法币的办法 最后达到驱赶法币的目的。在执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中 陈云同志强调要保证重点 并且要作长期打算，“积谷防荒”留有后备 以应救急。他说 如果每个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 有机动财力 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 应付不了 是不行的。他的这些意见 都是来自于实践 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因此 看得准 办得到 效果好。

（二）搞经济工作要着重用经济办法 要会算帐。陈云同志搞经济工作，数字观点特别强。引用数字非常准确、熟练。他常从数与数之间的关系找出事物内在的联系。并且强调做财经工作就要下决心学会业务 学会计算 仔细打打算盘。他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这篇讲话里指出：“人家来领东西 要给他计算一下 仔细打打算盘 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 人家要什么给什么 不算账 那是不行的。”在要求仔细核算的同时 还强调要抓紧

监督检查。他指出：搞经济工作要有“掌柜”的态度 当家的态度。当家就要理财，“检查要严格……”豆腐里挑出骨头来’”。在算帐时 项项都必须看一看 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 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反过来 如果没有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没有这种严格负责的精神 说大话 敷衍了事 不算帐 不计成本 不讲效益，怎么能够把经济工作搞好呢？

（三 要加强计划性。陈云同志强调搞好财经工作一定要加强计划性 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 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总之 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 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 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在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时，一再强调说明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 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 但工业中还缺乏计划性 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缺乏调剂和衔接 产生浪费和损失。因此 强调要加强计划性。“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 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他并建议东北局作出决定 制定 1949 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如有可能，则进一步拟定 1949 年及 1950 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学习和走向计划生产。

节选自《实事求是，做好财经工作》一文。

周太和，陈云的秘书。